



高教研究信息简报

第 26 期

右江民族医学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6 年 12 月

目 录

•本期关注•

回望 2016 探寻教育未来.....

错误！未定义书签。

•高教之道•

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7

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中国化”能力.....12

普及化高等教育应该是一流多元.....17

•立德树人•

高校思政课：坚持在改进中加强.....22

不能以精致的应试教育掩盖学习能力的发展.....26





• 本期关注 •

回望 2016 探寻教育未来

2016 年的日历即将翻过最后一页，回望这一年的全球教育，无不让人感叹各国技术发展之迅速、教育融合之深入、格局变化之深刻。

世界各国试图跳出教育本身，对教育的作用与形式进行审视，将教育作为推动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重要推手。

然而，随着信息科技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未来人才、知识与素养的定义在悄然变化，未来所需技能的标准面临调整，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也更加凸显。

未来，教育在应对全球挑战、促进世界可持续发展中，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评估全球化能力

“全球化能力”被定义为，能够批判分析经济全球化、跨文化问题；能够从多个视角理解差异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判断、对自身及对他人的看法；能够基于共同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其他人进行开放、适当并有效的交流。

经济全球化趋势一直在扩大、加深，并不断加速各国之间跨越国界的联系。在技术快速变革及交通成本日益下降的推动下，人们在不同国家和大陆之间的流动更加自由，这为各国带来更大的社会、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在政治方面，越来越多国家允许公民拥有多重国籍，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经济上则体现为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增加，跨国公司遍及全球。

经济全球化在带来创新、新的体验与更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也带来经济不平等与社会隔离。跨境移民对一些人而言，意味着能够在不同大陆之间通勤；而对其他人而言，则意味着逃离贫困与战争，要经过漫长的努力才能适应新的国家。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与机会，新一代人需要新的能力。无论在传统或在更具创新性的工作环境中，年轻人都需要与来自不同学科及文化的其他人合作，需要解决



复杂的问题并创造经济与社会价值；需要在面临与他人信仰与看法不一致的困难情景中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需要辨别文化特性与偏见，并承认自身对世界的理解不可避免会存在偏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简称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管理委员会决定尝试在 2018 年的测评中加入“全球化能力”评价，并将其定义为能够批判分析经济全球化、跨文化问题；能够从多个视角理解差异如何影响人们的认知、判断、对自身及对他人的看法；能够基于共同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与来自不同背景的其他人进行开放、适当并有效的交流。

“全球化能力”将成为未来全球教育的核心。现在全球面临的普遍挑战是如何将“全球化能力”植根于学校中，让年轻人更好地为当今快速变革的、全球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2. 应对城市陷阱

城市集中了生产力与就业机会，同时也集中了高度贫困与劳动力市场排斥。这些可能带来社会关系紧张，家庭与社区彼此不联系，产生社会疏远、信任降低与暴力等。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人们的焦虑和情绪扭曲相关。

当今世界上超过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这一比例到 2050 年有望增加到 70%。城市环境吸引了大量来自乡村及国外的人，这些人希望有更好的经济前景并更容易获得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保健及各种文化机构等。人力资本集中可能促进研究和发展，让城市成为增长与创新的区域核心；城市资源集中也使得商业更容易开展。

但城市也面临许多矛盾。他们集中了生产力与就业机会，同时也集中了高度贫困与劳动力市场排斥。这些可能带来社会关系紧张，家庭与社区彼此不联系，产生社会疏远、信任降低与暴力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与人们的焦虑和情绪扭曲相关。

2016 年，经合组织的报告《让城市为所有人服务：促进包容增长的数据与行动》显示，大多数城市的不公平程度都高于城市所在国的平均水平，呼吁各国政府重新审视城市住房、交通、教育与就业战略，确保城市不会变成不公平的陷阱。

教育，可以在应对城市陷阱中发挥作用。如教会公民读写，提供社会参与所



需的技能，支持创造与创新；扩大教育机会，尤其关注处境不利的群体，加大学前教育投入；构建满足地方需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体系；加大成人技能培训与创业教育投资，鼓励地方相关产业提供就业机会等。教育还需要为城市化进程加快带来的各种挑战做好准备，如开展增加与减少社区人口方面的规划，保护学校基础设施免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等。教育要对学生，尤其是最贫困社区的学生安全负责，监测他们在面临新的或不断加大的城市压力情况下，身体和情感的幸福状况。

3. 助力“学习的一代”

“学习的一代”愿景是指，所有儿童获得高质量的学龄前教育；所有男孩和女孩完成小学教育；所有 10 岁儿童具备功能性的识字和算术能力；低收入国家男孩和女孩获得中学水平技能的比例达到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2030 框架中描绘了“学习的一代”愿景——所有儿童获得高质量的学龄前教育；所有男孩和女孩完成小学教育；所有 10 岁儿童具备功能性的识字和算术能力；低收入国家男孩和女孩获得中学水平技能的比例，达到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低收入国家孩子获得中学以上教育的比例，接近目前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一国之中，最富有和最贫穷儿童群体的入校和学习不平等显著降低，并在消除其他形式不平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为实现“学习的一代”愿景，国际资助全球教育机会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学习的一代——投资教育，应对变化的世界》中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政策制定者们需要通过四个方面的教育改革加以落实——绩效、创新、包容和融资。

报告建议在绩效方面，为获得成功，任何改革的首要任务都是奠定好实施基础，提高教育体系绩效，并把结果放在第一位。在创新方面，成功的教育体系，必须提出富于创意的新方法以取得更好效果，利用各种机会创新——谁从事教育、在哪儿、如何进行等，以应对未来的教育挑战。在包容方面，工作和资源应聚焦于那些失学风险更高的人群。成功的教育体系必须涉及每个人，包括最弱势、最边缘化的群体。前两方面改革有助于教育体系更加高效，却无法缩小各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除非领导者们采取进一步措施，容纳并支持那些高失学风险的群体



——贫困的、受歧视的、女性的或者多方面弱势的群体。在融资方面，增加并改善教育融资。成功的教育体系需要更多更好的投资，并根据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进行投资，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受合格的教育，接受从学前到中学的免费教育。

4. 开发未来技能

结构性调整、技术进步与经济全球化驱动传统产业部门的深层次变革以及不断出现新领域，政府、产业和雇主需要抓住各种转变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理解变革对于技能开发和实际应用的重要内涵。

工人（无论蓝领或白领）具备不断变革的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合适技能吗？他们为下一次产业革命带来的就业冲击做好准备了吗？各国应该实施什么样的技能战略以培养人力队伍为未来做好准备？没有合适的技能，人们将徘徊在社会边缘，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也将放慢，并在全球经济中陷于困境。

2016 年，全球首个“技能峰会”在挪威卑尔根市召开。这个独特的国际会议召集了全球负责与技能相关的投资项目的部长们（包括教育、就业、经济发展、区域政策和政府协调等），就各国 2025 年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以及如何找到一个有效的、前瞻性的技能开发战略展开了开诚布公的讨论。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指出，“技能”是各国能否回应今天和未来经济与社会挑战的核心。要实现技能投资收益最大化，需要所有相关角色合作，制定和实施统一的政策以支持三个目标的实现——相关技能培养；技能在劳动力市场的激活；确保技能在职场和社会上有效应用。

世界银行也反复强调，当今世界，有数百万年轻人落入由于技能差距造成的裂缝之中——他们获得的技能与当今雇主需求的技能不匹配。世界银行主张实施“面向当年轻人的 21 世纪技能进程”，培养年轻人具备职场所需的各种现代技能，包括领导力、创业者态度等；扩大企业与大学和职业学校之间的合作，增强技术教育与培训内容的适应性。

澳大利亚政府也在讨论，在全球经济变革下，如结构性调整、技术进步与全球化驱动传统产业部门的深层次变革以及不断出现的新领域等，政府、产业和雇主应抓住各种转变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理解变革对于技能开发和实际应用的重要内涵。



5. 兑现“数字红利”

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会并改善服务供给的实例很多，但总体影响不足，分布也不均。要想让世界所有人受益于数字技术，就需要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

我们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信息通信革命进程之中。全球超过 40% 的人可以访问互联网，而且新网民还在与日俱增。世界最贫困的 20% 家庭中，将近 70% 的人拥有手机。更多最贫困家庭拥有手机，而非厕所或清洁用水。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技术迅速变革这一契机，建设更为繁荣与包容的世界。

2016 年初，世界银行发布其旗舰出版物《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主要探讨了互联网、移动电话和相关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指出数字技术虽然具有带来巨大收益的潜力，但仍未兑现。

报告认为，数字技术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迅速推广，但是使用这些技术应产生的广泛发展效益，即“数字红利”，却并未同步实现。数字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带来更多机会并改善服务供给的实例很多，但总体影响不足，分布也不均。要想让世界所有人受益于数字技术，就需要消除横亘于前的数字鸿沟，尤其是在互联网接入领域。

“数字红利”实现速度不够快有两个原因。首先，全球近 60% 的人口还不能上网，不能充分参与数字经济。各国国内由于性别、地理区域、年龄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人们之间的数字鸿沟长期存在。其次，互联网的一些预期收益被新风险抵消。既得商业利益，监管不确定性，以及数字平台有限的竞争，可能导致许多行业出现垄断。快速推广自动化，甚至包括中级水平的办公室工作，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空心化，使不平等情况更加严重。

如何才能兑现“数字红利”？报告建议，连通性至关重要，但还不足以实现全部发展效益。数字发展战略需要比信息技术战略更为广泛。实现所有人互联互通依然是重要目标，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各国需要营造让技术发挥成效的有利条件。数字投资需要“非数字配套机制”的支持，包括法规监管，便于企业利用互联网展开竞争，进行创新；提高技能，这样人们可以充分把握数字机会；问责制度，政府对公民的需求需要做出响应。同时，数字技术又能补充、强化这些配套



机制，从而加快发展的步伐。

6. 促进教育性别平衡

今天，女性仍然较少可能进入或毕业于高等教育的更高阶段，如博士或同等学历；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学科领域仍然代表不足；教师队伍性别失衡在各国也非常普遍。

最近几年来，尽管性别差距在高等教育阶段发生逆转，一直是更多女性成为大学生（2014 年，经合组织各国首个大学文凭获得者中，57%为女性），但是女性仍然较少可能进入或毕业于高等教育的更高阶段，如博士或同等学历。

同时，教育性别鸿沟也体现在学生的学习领域中。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学及数学学科领域仍然代表不足。而在其他学科领域，如教育和健康保健领域代表过度。调查显示，毕业于工程学的男性是女性的 3 倍，而毕业于教育领域的女性是男性的 4 倍。学习领域的性别不平衡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最终体现在收入上。例如，工程领域的毕业生收入比其他专业毕业生的高 10%，而毕业于教师培训或教育科学的毕业生收入比普遍的低 15%。

调查显示，男生观看科学相关电视节目、访问科学相关网站或阅读科学类书籍、文章的比例是女生的 2 倍。这一性别差异也存在于其他与科学相关活动参与方面。调查显示，男生对于他们的科学能力更自信（具有更大的自我效能感）。科学自我效能感性别差异最大的国家是丹麦、法国、德国、爱尔兰和瑞典。

另外，教师队伍性别失衡在各国也非常普遍。在 2016 年世界教师日，英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教师行业的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英国男性教师只占 26%，中学的男性教师占 38%，小学的男性教师只占 15%。英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政府的优先事项是让最优秀的教师进入课堂，当然包括各教育阶段的男性教师。无独有偶，澳大利亚一篇题为《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小学男教师招聘政策》的文章指出，澳大利亚男教师非常短缺，尤其是在小学阶段，男教师只占全职教师队伍的 19%。澳大利亚小学教师性别失衡在一些领域更加严重，不同州和地区之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性别失衡程度存在差异。文章提出，需要从目标设定、激励措施及提高教师地位方面推动男性加入小学教师队伍。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教育信息中心唐科莉 黄金鲁克)

• 高教之道 •

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

一方面,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另一方面,一些高校和教师日益浮躁,急功近利,扭曲了教育和科学发展的生态,与国家的意图和愿望明显偏离——

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为何出现偏差

当前,针对以工程或项目办法、靠行政措施进行高等教育建设,人们有一些争议和批评。笔者最近参与了一个有多位院士和高教领导参与的高教战略咨询研讨会,其间大家对各种扭曲心灵和行为的无穷的行政或事务性应付深表无奈和不安,包括科学家自尊受到伤害的一些审批和财务控制。公家用纳税人钱对教育和科研的支持自然应该受到监控,但不顾教育和科学规律的配置方式及监控手段不仅不会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还可能人为地造成大量的浪费。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针对高教发展的战略措施和政策频出,除被热议的“985”“211”外,还有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2011 协同创新”工程、目前如火如荼进行的“两个一流”建设工程,还有受到争议的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等等。在人才方面的工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国家级的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杰青”“优青”等在内的一整套人才计划。实际上 10 多年前国家就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不少人很困惑,这个工程的国家级人选是否可算为现在的“千人计划”,二者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些叩问并非真想搞清楚其间的关系,而是对某些不管前后衔接关系、不断“翻新”的工程和项目间接地发些牢骚或表示不满。

多年来,一方面可以说国家对高教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和资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听到或看到甚至直接体验到这些年来高教发展中存在的很多奇怪现象,例如对高教改革失去方向的批评,对我们大学做跟班式科研的无奈,对海归人才质



量的质疑，以及当前各高校针对“两个一流”对学科大拆大建甚或重新包装的抱怨，等等。作为业内人士和有责任感的公民，大家不仅为国家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未能获得应有的成效而造成的直接浪费感到遗憾，更对高校大量的高阶科教人才资源间接地被浪费而感到痛心。例如，很多高校领导和管理者明知有些工作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为了获得资源或得到支持无奈地努力着；很多大教授甚或院士不是深入一线教学和研究，而是奔走在各种评估或“跑关系”的活动中；很多教师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和填报各种表格、参加很多会议和活动，而且当事人对这些活动背离主业心知肚明，但又非常无奈地陷入其中。目前高教系统这种日益浮躁，急功近利的氛围，扭曲了教育和科学发展的生态，与国家的意图和愿望明显偏离。

到底是什么让高教政策导向和现实发展渐行渐远？笔者认为，除依法治教和大学管理的体制问题外，关键是我们一直在用工程或项目的方式配置资源、以行政的手段来导向和操控教育和科学活动，违背了教育与科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违背了教育与科学的基本规律

通常，教育和科学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也接受市场机制（学术竞争）和行政机制的引导。但不同的机制对教育和科学发展有截然不同的影响。例如，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工程培育出一些杰出人才，用意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但人才特别是杰出人才的诞生往往不是多方面提着水壶能浇出来的，而是在良好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环境下冒出来的。因此，真正的人才计划或政策应该是营造这种机制、文化和环境，而不是简单地选苗助长或拔苗助长。纵然，通过各种工程的“浇灌”也可能促成一些人才的出现，但却会因为环境的浮躁与恶化抑制了大量优质甚至杰出人才的涌现，这种忽视教育和人才规律的工程式拔苗助长往往得不偿失。

再如，教育资源可通过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配置。市场机制虽然也会诱发短期行为，但如果高校被赋予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和运行机制，就不会不关注自己的教育质量和品牌，考虑到长期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市场机制常会支持长期行为；然而，行政资源配置往往因为政绩等因素更多关注短期行为。但毕竟公立教育具有公益事业性质，肩负着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培育的历史使命，国家自然需要大力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或资源配置绝大部分应该以一种基于学校性质、



规模、使命而建立起来的科学、规范、透明的机制，而不是以各种名堂的工程来履行，从而使大家无须无休止揣摩下一阶段又会有什么新工程，也无须整天费心思地增强自己的谈判砝码或筹划某种策略去争取一些工程，更无须把大量精力和时间花费在各种填表和“跑关系”的活动中。高校领导、老师便会静下来，集中精力研究和探索如何搞好教学和研究，高校也可以慢慢回归本质，不再简单追求一些表面的指标，而是沉浸在育人的修炼中、兴趣的探索中、重大科研或发现的激动中。这么做，也许一时一些显性的、意义不大的指标会有所回落，但我们会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杰出人才、震惊世界的科技创新或科学发现会不断涌现，那时我们再也不用成天把“钱学森之问”挂在嘴上。

以我们现行的科研管理为例具体分析，不难发现，我国目前主要采取行政化的工程或项目配置机制，即使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这块本应支持以兴趣为主的基础研究、维护国家科学精神和文化的、孕育一批科学家的净土，也设法搞出了各式各样的“工程”。我国科研主力之一的高校，其科研管理体制采用的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从国家到教育主管部门再到高校，层层管理，高校的科研管理部门是一级行政机构，有特定的行政级别。其次，高校科研活动组织方式行政化、工程化、甚至运动化，例如，当下不少高校及其主要研究力量就沉浸在“两个一流”的运动中。行政人员由于掌握着资源分配权而居于主动控制地位，充当评审和验收的角色，研究人员则为了申请项目而奔波忙碌，不断准备申请材料，按照行政人员不断变化的要求提交信息，行政人员的服务角色不复存在。再次，科研成果评价体系和激励政策行政化。目前我国科研评价中体现的是行政逻辑而不是学术逻辑，权力和官本位深深侵蚀学术界，造成了学术界急功近利、学风浮躁，为政绩而重数量轻质量，很多学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没有含金量，而且重短期轻长期，项目评价以资助的行政级别论高低，论文评价则以期刊的检索情况为依据，而不是考虑研究本身的价值等等。可见行政机制取代学术机制主导科研管理问题很大，而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干预学术事务，根源在于行政权力掌握着学术资源的配置，而且配置方式失当。

再深入观察教育的资源配置，因教育特别是公立教育体系的公益性，全世界的很多大学都要靠政府的资金来维持运营，因此政府支持大学并不鲜见，但政府



如何把资源配置到大学却有行政和市场（学术竞争）两种机制。

我们国家的资源配置是典型的行政主导模式，教育拨款从国家到大学，要通过国家或教育部设立的各种项目和工程来向财政部提出预算需求，然后再以项目和工程的名义把钱分拨到大学。如过去的“985”“211”和现在的“两个一流”，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进了笼子，就会得到大量的投资，因此大批大学和其力量倾尽全力，不惜包装和拼凑，设法带上“两个一流”的帽子。在这个过程中，部委的话语权很大，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家包括教育部门大家俗称的“跑部钱进”现象很常见。

很多西方的大学并不采用行政的机制，而是更加注重资源如何支持学术活动本身。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的公立大学也接受政府的拨款，但一般会通过一个拨款委员会来具体运作拨款事务，而拨款委员会的成员包括高校、政府和业界的代表，能够基于多方的利益来确定拨款方案，达到多方满意和共赢。已有很多发达国家如何支持教育和进行资源配置的经验研究，这里无须赘述。

再深入剖析我们各类人才工程，不能发现其逻辑弱点。人才学和人类历史不断证明，杰出人才和重大科学发现大都是冒出来的，在可自由追随自己兴趣、能长期静心钻研的生态环境中，所有的苗子都有可能成为大才、对兴趣的执着追求可能孕育出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一个社会如果能构建这种良性的生态环境，伟大人物和重大的发明创造便会层出不穷。但我们目下的资源配置机制、教育科研评价体系、人才选拔工程虽然也可能浇灌出几棵苗甚或大树来，但却失去了大树成林的机会。各类人才工程的动议很好，笔者很荣幸也曾是早年“千百万人才工程”的一员，但对近年来日益遍地开花的各类工程选拔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类投机行为深感痛心，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不良后果不只是浪费纳税人的钱，更重要的是破坏教育和科研生态，值得决策层和各级政府认真反思和关注。

营造尊重教育和科学规律的生态系统，让杰出人才和科学创举冒出来

教育与科学本是一个系统和生态问题，生态首先强调共生，系统中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是生态存在的前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自主的动态调整，主体关系的失衡或者个别主体的过度强势，必将破坏生态平衡，从而难以实现良性循环。



其次，生态系统具有涌现性，当环境条件具备，就有可能通过自组织产生良性循环。

例如对于科学研究，我们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冒出更多杰出人才和伟大的科学创举。我们国家钟情的颠覆性技术，如智能手机、智能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3D 打印、物联网、页岩气开发等最新一代影响社会发展的新技术，大都是由苹果、谷歌等公司开发的，原创性的科技创新或设计并没有出现在拥有全世界最多人口而且是全世界公认的“最聪明”民族之一的中国。从个体角度略加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其中的缘由。除了大学里主要精力在角逐那些工程、教育模式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教知识的模式外，社会的浮躁也阻碍着我们创新人才和成果的涌现，例如中国社会成功的观念太单一，扼杀了孩子们的兴趣和追求空间；长期应试教育抑制了年轻人的创造性；家长们对学生的过度溺爱和终生干预使得不少想猎奇、有想法和创意的青少年放弃了初心；全社会对短期财富的追逐挤压了那些对个人兴趣长期执着追求的空间等等。于是，很多颠覆性创新的机会只能留给像硅谷那样包容失败、可以在车库或地下室有一顿没一顿的创业者。另外，从机制上我们也可发现，曾经在 20 世纪主导诸如互联网、隐身技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激光、无人系统等重大颠覆性技术开发的美国军方，也开始重视与硅谷的合作，注重更加灵活多元和市场化的方式，而不再仅仅依赖国家行政主导的大项目制。

综上所述，不加限制的工程和项目式的资源配置机制、政绩性的评价体系、工程性的人才选拔方式一定会导致包装、作秀、投机行为的泛滥，孕育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扭曲教育和科学的生态环境。那么，到底如何真正建立有利于教育和科学长期健康发展的资源配置体系？通过科学、规范、透明的机制营造尊重教育和科学规律的生态系统，以替代行政主导的以工程或项目为主的配置方式非常关键，例如以科学、规范、透明机制主导高教的资源配置，使高校静心于教育与科研主业，回归本质；建立质量与贡献导向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加强学术权力在高校资源分配中的决策权；为人才的成长和科学研究创造生态环境而非直接刺激和鼓励短期行为等。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 西交利物浦大学执行校长、英国利物浦大学副校长席酉民; 西交利物浦大学领导与教育前沿研究院副院长张晓军)

中国文化和教育的“中国化”能力

放眼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发展, 迷失自我的“全盘西化”已无处不在。在哲学、方法、内容、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 以往我们曾经反省过的“言必称希腊”问题, 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翻看当下研究生、博士生、学者、教师的文章、著述, 几乎无不以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为依据, 信之若神明, 而普遍缺少自己的独立分析与思考。这对希望创新但又缺乏自信自知的文化、学术和教育群体而言, 问题是根本性的。

近年来, 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外学校开始教授传统文化, 并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是建构美好和具有创新潜质的文化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撑。但迄今为止, 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 还存在不少误解, 亟须厘清和纠正。

对中国传统文化误会之种种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误解,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是精华和糟粕并存的, 它与世界上所有的文化一样, 不可能是完全、绝对和纯粹的正确。中国的先贤对于传统的态度是主张“瑕不掩瑜”, 并明确意识到, 没有缺点和糟粕的文化是根本不存在的。目前, 有一些丧失自信且又不肯自知的所谓学者, 对本土文化过分苛求, 对外来文化顶礼膜拜。这显然不是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也必然会影响对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和传承。

与世界上所有主要的文化类型一样,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应该是人类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 所谓的人类现代文明, 在思想、概念和制度等方面, 从西方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 直到后来的发展中, 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积极、有效的参与。对此, 西方的伏尔泰、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等都有明确的论述。



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也有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直接参与,“和平共处”“第三世界”“一国两制”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的理念和准则,都来源于中国和中国文化。

长期以来不少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甚至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东方的古老文明,都概括为具有专制品格的“大河文明”;而对靠掠夺、侵略、激化文明冲突的一切西方作为,则美其名曰具有开放、拓展、科学、民主和创新品质的“海洋文明”。显然,这种简单的、双重标准的评价是逻辑混乱和漏洞百出的。我们不讳言,中国的儒家文化曾被专制统治者确定为统治思想,但即便在近两千年“独尊儒术”的中国历史中,不仅诸子百家依然存在,来自世界的其他文明,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能很好地融入并与之并存;而推翻专制和腐朽统治的革命者,依然会选择儒家确定的“仁政”“大同”“天下平”的理想作为目标。对于这些真实的历史,对比现实中的世界霸权,何谓专制、何谓民主,应该不言自明。

近百年来,不少中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伦理、统治术,在日用科技方面远不如西方,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科技就是一切竞争实力和话语权的有力支撑。为此,有关中国的科学技术传统被彻底忽略了,其内容在中国各级各类教育中越来越式微。且不说西方及世界的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四大发明”的基础上建构的,就是对现代高等教育中的许多专业,中国历史文明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此,不仅有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可做印证,且有越来越多的中外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已经意识到,中国智慧、中国方法和中国经验颇具改革开放的借鉴价值。

在不少人看来,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不断否定自己文化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但也有许多历史真实给人不同的解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国外获得 37 个博士学位,毕生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抨击旧制度最烈的鲁迅,不仅热衷于中国小说史、整理出中国的“故事新编”,包括他的《狂人日记》,也是直接借鉴于唐代的道家著作《无能子》。可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中,可资改革自新的资源极为丰富,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特别关注。毛泽东在其文集中多次表达了要“古为今用”的思想,认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需要继承的遗产,并多次表示中国的书院是一种理想



的高等教育和专业研究模式。

一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警惕”不要全盘西化,但放眼中国的各级各类教育和学术发展,迷失自我的“全盘西化”已无处不在。在哲学、方法、内容、形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以往我们曾经反省过的“言必称希腊”问题,在今天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看当下研究生、博士生、学者和教师的文章、著述,几乎无不以西方学者的思想观点为依据,信之若神明,而普遍缺少自己的独立分析与思考。这对希望创新但又缺乏自信自知的文化、学术、教育群体而言,问题是根本性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相辅相成之体现

回顾在 1949 年最初确立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原则时,继承传统是非常明显和明确的重要基础,包括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民国的传统、苏区和延安的传统、学习苏联的传统等。可见在当时,发展文化教育的思路 and 认识是比较清晰和明确的。当时学习的马列主义的“三个来源”、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和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对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有积极和鲜明的态度。而在今天,我们却集体迷茫了,为什么?应做认真和深刻的反思。

传统文化的价值既然很明显、很重要,教育就应该有所作为。任何一个伟大的、创新的时代,都必然要伴随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并以此作为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但是面对已经几乎完全“西化”的教育系统,传统文化如何回归或“反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中国教育本身应该具备的传统,被忽略、排斥近百年后,已经被视为“外来的异物”,易遭遇“排异”反应,因此这种“反嵌”是非正常的“嵌入”。是相互排挤,还是寻求融合?抑或另辟蹊径、另寻思路?探索和研究的空间不可限量。

从总体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教育是不相冲突的,且在许多方面可以相辅相成。对此,教育界、学术界、思想界须有认真、严肃和负责任的深入探索和实践尝试。

在教育观念上,中国的教育史记述了许多与现代教育改革价值取向一致的思想、理念和意识,涉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多元智能、因材施教、合作学习、德艺双馨、学以致用、环境建设和影响、理论联系实际、建设学习型社会等。几乎所有现代最先进的教育观念,都能找到中国教育的先行探索。这不仅有利于中国教



育的发展改革,也可以为人类提供具有历史跨度的中国好经验、好思想。

在学制上,中国的传统分为蒙学、小学和大学三个主要阶段。蒙学为 0 岁至 7 岁,偏重语言、思维、社会化、生活习惯的养成等;小学为 7 岁至 15 岁,偏重文字、经典、立志和身心健康,目标是“成人”;大学为 15 岁至终身,偏重专业学习和未知领域的探索,强调践行理想。这三个阶段虽不及现代学制细化,但二者的基本判断和目标是大体吻合的。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教育,兼顾家庭、社会和学校三方面的融合,注重移风易俗和民众教育(历代农医之学普及到民间,元朝有体制保障的“社学”),关注正规教育和非正规学习之间的互补与互动,注重官学、私学或体制内外教育之间的生态平衡,并有包容学校且超越学校的专业化的人才评价体系。

在教学内容上,中国传统教育规定性学习和建构式学习并举。“师法(专业化的标准教育)”和“家法(基于专业研究的个性化探索)”的分化,可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激活许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诸子百家和各行各业的进步均有配套的专业技术传承模式与行业评测标准,发展的空间是开阔和相对自由的。尽管从官方的角度有道德、伦理和法制教育的“必修”要求,但是在整个教育和社会学习生态中,对所有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知识技能学习等,几乎都有所覆盖或涉及。至少从汉代开始,对于域外学习资源的引进就已经受到重视。至少从元代开始,西方科学技术的内容就已经在中国的教育中渗透,因为中国的文化和教育具有深深的自信,更具有“中国化”的创新能力。

在教育教学方法上,中国的传统注重学习主体的主观作用。“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说法,明确体现了中国方法对学习者的自身学习需求的充分尊重。为此,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反对“揠苗助长”、强调思考质疑、主张知行合一等原则,在教育界深入人心。从宋代开始,中国就有“学分制”的尝试,不把教育和学习限定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另外,对于哲学和方法论、系统教育和碎片化学习的相辅相成关系、学校和教师的作用、能力和素养提升的多元化途径等,也都有丰富的探索和实践。

在教育标准和评价考试上,中国的人才思想和科举制是贡献巨大的,而前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实施过程中的僵化和专制等问题。另外,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三



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和“浪子回头金不换”等意识,都体现了积极、开放、包容、辩证和发展的人才观、评价观,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有明显的借鉴价值。

寻求中国传统文化“反嵌”现代教育之突破口

基于上述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要回归或“反嵌”到现有已经非常西化的教育之中时,应寻求几个重要的切入点或突破口,这是在推进相关实践之前应该思考清楚的。

首先,要通过求同存异的探索,找出中外教育大体一致的地方,并有效加入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这样可以使中国的教育者和学习者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更适合教与学的途径和方法,加深对相关知识技能的中国式体会和感受,进而提高学习效率。为此,不宜在现有的教育体系之外另立“国学”体系,以致加大教育本身已经“过重”的负担和压力。合理和可行的思路是,通过对各学科、各专业的融入和渗透,使之逐渐加强“中国化”。

其次,要充分利用中国教育传统善于引导和激励学习者自主学习的经验,促进学校教育和社会学习提高效率。这既为传统文化系统地融入现代教育争取时间和空间,同时也能缓解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促进各学科教与学的改革与创新。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和终身学习时代,中国传统学习中的碎片化、多途径、积累性和建构性等经验,都可非常有效地突破现行学校教育的许多藩篱或禁锢,使教学本身与个体学习需求更好地契合与互补。

再其次,要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学习是有自身规律和系统性的。不仅应特别关注哲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基础学习,要熟悉“经史子集”的体系,还应从学前教育到博士生教育的各个阶段,为学习者提供具体和适宜的指导书目。今天的学习者应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既不是“小儿科”,也不是与现代生活、现代科技毫不关联的“老古董”,而是中国人、中国的发展创新必须借鉴的最重要的资本。

最后,要有意识地在人类教育的发展中展示中国教育的传统魅力和经验,积极参与人类理想和教育标准的当代建构。2000年以后,中国由济宁市委、市政府牵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孔子教育奖”,向全世界昭示了孔子以及中国教育传统的永恒价值,使中国人的自知、自信、自觉、自立和自强等意识有了重要的回归或恢复。中国人要办好孔子学院、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复兴,做好这



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由此可见,要想正确、积极、有效地认识和传承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在相关问题的研究上更务实、更有定力、下更大的功夫。先要找回自我,进而才能找到前进的正确目标、方法和动力。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6 年 11 月 03 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程方平)

普及化高等教育应该是一流多元

按照美国高等教育专家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当前,世界上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达到了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预计在 2019 年达到 50%,也将步入普及化阶段。18 岁至 22 岁的年轻人中有一半的人进入高校学习,这是历史性的跨越,不仅有助于开发人力资源,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更有助于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然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仅就现阶段而言,大众化的急推猛进似乎还未完全“消化”完毕,马上又迎来普及化,我们该如何为 2019 年高等教育普及化做准备呢?本文提供的观点和理念,具有启发性。

普及化阶段,学生学习的激励机制不应该单纯来自就业

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变为平稳增长,高等教育普及化会带来规模的持续增长,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会形成一定的“涨力”。这种涨力如何化解,就需要高等教育的创新特别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我们需要认真审视融入世界大潮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经验,吸收可为人类文明共享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之精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之路,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中国未来乃至全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发展蓝图。从东亚地区的经验看,学生的学习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在基础教育以升学为导向和高等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动机与经济



发展成就成正比。在经济腾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能够提供较多和较好的就业岗位,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较高,因为毕业可以找到好工作,而到了经济平稳增长甚至停滞阶段,就业岗位会减少并且“好”的岗位减少更为迅速,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大学毕业生增多,学生的学习动机下降,厌学情绪上升。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们比较强调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继续强调经济功能的同时,我们还要充分认识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从社会功能看,到了普及化阶段,超过一半的年轻人进入到高校学习,现在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讲公平,未来在高校也要强调公平,不同类型的高校学生都应该得到适合的教育机会,高等教育系统能够为学习者提供更充分、更多样、更适合的学习机会,进而促进社会公平的发展。从文化功能看,主要是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和学习的观念,高校学生学习的激励机制不应该单纯来自就业,而是对知识的渴求和自身能力的提升、综合素质的培养,特别是主动积极的学习精神与创新意识。这点对于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因为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呼唤科技创新与新的发展模式,需要人的创造力量特别是年轻人的创新能力,通过创新带动就业创业,而不能只是坐等就业岗位。这对于高等教育普及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建立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多元的学习空间,形成注重能力提升的人才培养制度和体系。

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于产业结构不再是简单的适应关系

我国现阶段的本科专业是依据专业目录来设置的,专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控制人才培养规模与结构、实现人才培养供需平衡的手段。但是,人才资源的积累,特别是现在的人才培养与未来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者对应关系。预防毕业生就业难的根本出路不是试图设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无缝对接,而是应该把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综合能力培养置于首位。

高等教育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引领与适应”的关系,人才资源具有创造性、创新性与累积性,当人才资源聚集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引发“内源式”产业结构升级,也可能因“输入式”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吸纳人才资源聚集。二者



是互动的关系，而不是高等教育对于产业结构的简单适应关系。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角度去计算如何根据未来产业发展来实现人才培养结构优化，也许是徒劳而无益的。

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高等教育面对未来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究竟应该培养什么类型、何种规格人才，什么样的科类结构、层次结构、类型结构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是需要重视的问题。传统观点认为，高等学校需要细化地研究针对未来经济和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然后据此研究学科专业和课程设置，从而建立起所谓合理的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但是，人们无法准确预测未来几十年、甚至未来 10 年经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无法预测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对于人才培养类型的要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亨利·M·列文教授提出，欧洲普遍采用的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倡的人力预测方法

（manpower planning approaches）也是失败的，“这种方法首先把对部门经济产量的预测乘以一个固定的表示每单位产量行业需求的公式得出行业需求，再将行业需求进一步通过严格的公式转化成未来劳动力的教育需求。这些关系的成立，需要假设的部门产量与行业结构的比例。各个行业教育需求的比例是固定的，而这种人力预测的失败主要因为教育需求与职业、职业需求与经济产出间的关系过于僵硬死板，技术上、组织上、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价格上的不同预测的变动以及部门产出预测的不准确，会削弱教育需求预测的准确性”。

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呼唤人才培养制度的创新。到了普及化时代，对于人才培养要重新做出定位，即专业教育向后推迟，改变以专业教育为主的培养模式，建立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以通识教育、终身学习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当前，我国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综合改革方案中也都提出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培养模式。

普及化阶段，还要补上高等学校多样化这一课

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形成多样化的、公平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分层分类和高等学校多样化，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进程相一致，高等学校类型多样化是高等



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处于精英阶段时，高等学校呈现“同质化”的特征，到了大众化阶段后，则会形成高等学校多样化。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了高校学生数量剧增、高校数量增加和高校规模急剧扩大，但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层分类，更谈不上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这也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重要原因。

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只有高等教育的多样性才能适应普及化时代学生来源的多样化、需求的多样化、人才培养类型和规格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这必然要求改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由高等教育的“同质化”走向“多样化”“异质化”，实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分类管理、分类评价。真正代表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不仅仅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多样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应是各类高校平衡发展，各展所长，既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世界一流的应用型高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一个世界大国，真正需要的不是少数几所一流大学，而是一流的高等教育体系。2002 年世界银行《构建知识社会》的报告认为，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贡献的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不仅有研究型大学，还有理工学院、文理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社区学院、开放大学等。一流大学的建设是无法脱离整个教育系统的，世界银行高等教育部主管萨尔米对此认为：“大学系统的变革不能孤立地进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规划及其实施情况，应密切联系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小学教育正在进行和将要实施的改革以及发展其他类型高校的计划，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包括教学型大学、研究型大学和技术型大学的高等教育系统。”未来若干年，伴随着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建设，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大学的转型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我国将逐步形成以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以应用技术大学为代表的应用型本科院校和以示范性高职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体系。



普及化阶段，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应该实现学分互相承认

普及化阶段的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教育理念要求建立开放式的教育制度，形成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可以实现学分互相承认，以灵活的学习制度和教学管理制度为纽带，搭建起开放多元、便捷畅通的高等教育“立交桥”和终身学习平台，为每位学习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学习机会。

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高校的综合化是表面上的而非实质的综合化。所谓表面上的综合化是指学科设置的全面化，文理工法医农管等各个学科门类一应俱全，从外在的形式上看是综合大学了，但真正的实质意义上的综合化是能促进校内学科专业交叉融合的综合化。我国高校综合化改革大致完成了第一步，而没有进入到第二步。

而具体到“立交桥”，我们一直提倡对外开放，与国外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提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政产学研用结合，这些都是高校各院系、各学科专业对外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新动向，但另一方面恰恰也是高校内部各院系、各系科专业间却壁垒森严，各院系之间学生选课、教师资源共享一直未能实现，何谈实质上的以促进学科专业融合为目标的深度综合化，又怎么实现人才培养创新？我国高校和国外合作密切，有各种联合人才培养项目，但恰恰是国内高校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没有合作培养机制。既然和国外大学能够联合培养，为什么国内高校之间不能够联合培养呢？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高校之间的开放合作与高校内部系科专业的开放、综合与融合。开放式的制度也是包容式发展，需要在包容发展中推进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除了政府办学之外，还会有社会多元的办学形式建立起来，会逐步形成以政府主办的公立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企业大学等共同包容发展的高等教育系统。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还要重视和规范非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学生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充分、多样的受教育机会。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脚步已经悄然走近，高等教育需要主动变革，探索中国特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这既有理念的变革，也有制度的设计与功能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创新。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2016 年 11 月 08 日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副院长李立国)

• 立德树人 •

高校思政课：坚持在改进中加强

核心观点：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真正提升办好高校思政课的信心和信念，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的质量和水平。高校思政课“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在实现“四个正确认识”上取得更大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深刻阐明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意义、目标定位、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出了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的总体要求，为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坚持在改进中加强”的总体要求中，关于高校思政课的建设目标和教学要求、教学目的和任务、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问题，是提升高校思政课建设质量和水平的重点。

从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的高度，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目标和教学要求的认识，提升“坚持在改进中加强”的信心和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高校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在解决好这个根本问题中，高校思政课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发挥着理论武装、政治引领、思想教育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起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教育的重要作用。“坚持在改进中加强”，重要的是要提高高校思



政课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真正提升办好高校思政课的信心和信念，切实提高高校思政课的质量和水平。

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的高度，提高高校思政课建设目的和任务的认识，明确“坚持在改进中加强”的基本方向和必要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四为”，把党的教育方针同党在现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把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同未来趋势紧密结合起来，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方位、现实旨向和未来趋势，也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与建设目的和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举旗定向、谋篇布局、攻坚克难、强基固本，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在这一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奋斗目标的基本遵循，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形态。在这一理论新形态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根本战略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为战略举措，确立了治国理政的总体战略、整体方略，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大计。“五位一体”总布局，凸显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在根本上就是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以此形成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全面部署。新发展理念是构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纲领和决胜攻略的核心内容，也是今



后很长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要求和总方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根本目标，也是其价值追求和精神力量的根本所在。

针对当前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实际，根据“四为”的发展方向，要把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三进”工作，作为把握“四为”方向的重点任务，作为“坚持在改进中加强”的重点任务。

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的高度，拓展和深化高校思政课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使“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更好地体现在满足学生成长发展的理论需要和学习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强调，要从“四个正确认识”上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这“四个正确认识”就是：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为学生点亮理想的灯、照亮前行的路，激励学生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这“四个正确认识”切合了学生成长的理论需要和学习期待，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

“四个正确认识”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中“问题意识”探索的深刻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五个方面的“问题意识”。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面对的是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态势，凸显了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等“问题意识”；二是



在经济和社会建设领域面对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产生了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问题意识”；三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面对的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提出了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问题意识”；四是在更为广泛的思想文化领域面对的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提出了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等“问题意识”；五是在党的建设中面对的是全面从严治党进入重要阶段、党面临的风险和考验集中显现的新形势，提出了如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等“问题意识”。

高校思政课多年来增强“问题意识”，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从五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四个正确认识”的论述，全面地把握了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和期待。

综合五个方面的“问题意识”和“四个正确认识”，在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上，一是涉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二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教学内容；三是涉及当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教学内容；四是涉及大学生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的教学内容；五是涉及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修养的教学内容。从这五个方面的教学内容及其教学体系上看，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一样，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和出发点，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另一方面“必须随着实践发展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命活力，以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这



两个“必须”，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怎样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科学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里提出的两个“一定要”和三个“着眼于”，与两个“必须”结为一体，构成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观的基本精神。高校思政课“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教学体系，在实现“四个正确认识”上取得更大的成效。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顾海良）

不能以精致的应试教育掩盖学习能力的发展

人的素养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基础素养，一个是核心素养。基础素养是基本要求，核心素养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促进学生终身发展的那部分。道德素养和学习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培育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学习能力是教育的根本功能，是教育的社会属性与学生自身潜质的统一。教育改革与发展涉及诸多领域，提升教育质量及学生学习能力是中心领域和根本任务，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他的教育改革与发展都是枝节的进步。因此，以全面提升学生学习能力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是教育发展的重大实践课题。

道德素养和学习能力是学生发展的核心要素

无论我们把教育描述成什么样子，其根本问题是，我们能够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和条件。这就需要持续不断地开展教育变革，促进学生提升道德素养和学习能力。

道德素养和学习能力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核心要素，培育学生的道德素养和学习能力是教育的根本功能，是教育的社会属性与学生自身潜质的统一。



我认为，德育不是教育的一个类别，道德教育应该贯穿人生的全过程，体现在学校教育的各个方面。德育是面对所有人的教育，不是针对特定人群的教育；德育是综合性的教育，不是学科性教学；德育是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教育，这是德育的最高境界，着力培养学生的精神世界是学校教育不可忽视的。我认为，学生的发展要在生活德育、实践德育、融合德育、常态德育方面开展探索。

学习能力是学生发展的基本要义。其一，学习能力不仅仅是知识学习的能力，它包括学生在实践、创新、生活和道德等领域的学习能力，人们经常提及的素质、素养、道德都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其二，学习能力是造就学生全面发展能力的基础，也是人的终身发展的基石，不会学习就不会发展；其三，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是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也是教学改革的基本方向，通过进一步转变教育观念、教育环境、课程设置、教学方式、教师行为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其四，我国教育在培育学生学习能力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直接影响着提高教育质量的任務，也影响着学生的素养的形成。因此，着力提升学生学习能力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主题。

如今的教育还面临着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以学习成绩替代学习能力的倾向比较明显。二是以学习技巧、技术驱动学习能力的趋势正在形成。学习需要方法，学习也需要技巧，但是最根本的是学生自主学习。三是以简单化、行政化方式强推学习能力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以单项实验或改革助推学习能力的情况比较普遍。很多教育部门、教育机构都在尝试改革实验，其实真正的教育实验不多，而教育的发展，一定是综合发展。五是以精致的应试教育掩盖学习能力的问题不在少数。

到底什么是学习？教育研究工作者应该从学习者真实的学习中来发现，如何提升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如何评价学生的学习，评价如何促进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的教育评价往往是在学习的某一个阶段，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评价学习的结果，甚至通过学习的成绩来评价。学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的评价要从评价结果中来促进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需要深入了解学习过程中发生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来改进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应结果与过程并重，进一步关注学生发展的相关因素

如何评价和解读学习的生命系统？在学习过程中，学习的生命系统是评价中很少关注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生命，学习的生命包括他生命的过程，还包括他如何用脑，他的身体状况，生命对于学习的意义。

如何评价和解读学习的社会条件？学习是有社会条件的，学习能力强不强，与个人的社会条件紧密相关。教育的条件还包括学校是不是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教育评价也要更多关注评价对象周边的环境（有些是物理环境，有些是文化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重家庭教育和户外家庭教育，这些确实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教育应该是从家庭开始的。

如何评价和解读学习的人际关系？在评价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成绩和结果，而每一个真实的学习者是怎样学习的？他和谁在学习？他的同伴学习效果怎么样？他是否有能力组织大家一起学习？这不仅是学习的形式，更是学习的状态。一个真正会学习的人一定会运用同伴学习，我们的教育评价应该向他的人际关系方面去延伸。

如何评价和解读学习的认识方法？评价也要关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认识的方法。有一种说法，教育实际上是教学生学会思维，这个可能有点绝对，但还是有道理的。每个学生在学习中如何思维？他的认知倾向是什么？面对这个学科，他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来掌握相关的知识？思维方式方法对于学习的作用能否评价出来？能否通过评价的方式来帮助学生提升？是值得我们考虑与探索。

如何评价和解读学习的融会贯通？知识、技能、情感、价值观是否融会贯通，学校发展和学生德智体美劳能否融会贯通，最后都融会贯通到学生个人身上，这种融会贯通的境界是我们要关注的。

如何评价和解读学习的美学意境？一个学习能力强的人，一定有艺术素养在支撑。我曾经听过一堂推门课，这是音乐课。这个学校在艺术教育上面真是独具匠心——教师让学生在课堂上自己编排音乐剧，学生自己找道具、分配角色。这所学校的校长对我说，艺术教育最具综合性。我认为，这位校长悟透了艺术教育的本质。而艺术教育对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到底如何，如何测试？如何来促进？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应建立基于学生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比如，探索建立学业水平与学习能力相结合的评价方式，从成绩转向能力；探索建立侧重调查评定学生学习特点的学情调查，从教师转向学生；探索建立面向学生个体的学习能力追踪评价，从结果转向过程；探索建立基于促进学习的教育条件的督导评价，从“随意”转向聚焦；探索建立以学校为实施主体的学校发展性评价，从“裁判”转向自主；探索建立基于学生发展和学校发展的综合评价体系，提供教育评价的服务。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委员会理事长 时龙）